澳门丛书

Wenming de Boyi

文明的博弈

——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

⊙刘然玲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刘然玲博士的论文 《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 “递进重构”模式研究》即将出版成书。她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并说她知道她的导师何芳川 教授与我在世界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方面有相同的兴趣，而且曾有合作写书的长期计划；但如今她这位导师已不能为她作序了，觉得找我写序是恰当不过的。念及遽然辞世的好友是我与这本书之间的学术纽带，我立即同意了。我详细地阅读了这本书，觉得可以向读者们郑重推荐。

北京大学早期的知名学者姚永朴教授（我妻子的外曾祖父）著有《史学研究法》一种。我年轻时就读过这本以文言文写成的历史学的方法论，从中受到不少启发。近年来，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很感兴趣，也从他的书中学习到一些历史学的方法论。他们都注重史观建立的重要性，史料选取的严谨性以及史论辨析的科学性。刘然玲博士在本书中所采用的史观、史料、史论都很符合中法两位学者所揭橥的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

澳门虽是弹丸之地，但它是儒、道、佛三家兼备的中华文化与以基督教及重商主义为代表的欧西近代文明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历时近五百年而至今未变。本书开宗明义就点出了澳门文化的形成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地位虽然可以与果阿、马六甲、长崎等早期葡萄牙人聚集地相比较，但又有其他 何芳川（1939—2006 年），著名历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等。在非洲史、华侨华人史、亚太区域史等领域成就斐然。

几个地方所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样一个宽广的视角与长时段的观察就是本书的史观。

然而，对于澳门文化的特质与形成过程，不能只以广阔视角快速扫描或以 “长时段”（即布罗代尔所说的 “delongue durée”）作

粗略观察来断定。从葡萄牙人初抵珠江口，到葡人强占澳门，到澳门以一个 “欧洲”城市的面貌出现，再到今日回归中国这近 500 年的时段中，充满着许许多多个人与团体的活动与经验。这些都是研究澳门历史与文化的学者所应挖掘与梳理的史料。本书作者所挑选的许多史料大都很有意义。比如说，对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热诚与策略的描述，对 “神父之船”的介绍与分析，对妈祖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互动的阐明，对“番妇”居澳合法化的提点等等，都向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也为作者提出的观点—— “递进重构”模式提供了历史事实的支撑。

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学者，对自己发掘与掌握的资料必然会归纳分析，并以之为基础，寻求推进研究课题的特定方向与方法。我认为本书的史论部分相当新颖且具开拓性。

本书为澳门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视角，既关注这些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形成的关系，更注重它们之间的 “差异”和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包容或渗透所产生的复杂关系以及最终生成的澳门新文化形态。作者还用宏观结构和微观动力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三个层次来展现澳门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趋向，即从全球化的角度俯视澳门，从区域化的研究审视澳门，再从澳门本土化的发展展望世界。

我个人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融合过程特别感兴趣。对多种异质文化相遇后的相互影响，刘然玲博士提出 “物理作用”后的 “混合物”与 “化学作用”后的 “化合物”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代表两种结果或是寻求的目标。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P E Trudeau)在上世纪七十年即曾主张加拿大境内的各民族应共同组成一幅拼图 (mosaic)，认为美国人所自豪的熔炉 (meltingpot)并不可取。其实，在 400 多年 “递进重构”的过程中，澳门文化既有拼图，又有熔炉，还包括了两者之间的不同组合。华裔天主教徒，葡中混血信奉天主教说葡语的“土生葡人”，以及葡人与华人或马来

人混血，但于19世纪开始转用英语的 “英语葡人”这三个不同社群就是澳门人口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说明。

刘然玲博士提出的 “递进重构”模式不限于澳门一地，也不仅限于果阿、帝汶等前葡萄牙殖民地。它应该可以适用于更多曾经长期有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区。譬如，位于地中海中部的岛国马耳他，其面积和人口都与澳门相仿。它的正式历史由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向它殖民开始。从公元前3世纪起，经过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前后约1300年的统治之后，它于11世纪末被源自北欧的诺曼人占领，16世纪又转由被奥斯曼人驱逐出地中海东部的十字军残余所统治。自19世纪初迄20世纪中叶，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地中海区域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

马耳他于1964年独立，2004年加入欧盟。今天的马耳他是一个经过 “熔炉”2800多年长期 “化学作用”的纯一 “化合物”：它的公民几乎完全是看起来像南欧人与北非人融合而成的，操属于闪米语族的马耳他语（近似阿拉伯语但使用许多意大利语和英语借词，用拉丁字母拼写），信奉天主教的马耳他族。恰似澳门自我定位为中华文化地区与拉丁文化地区的界面，马耳他基于它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自我定位为欧盟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界面。有兴趣的学者大可以用刘然玲博士在本书中以澳门为案例所提供的理论性的分析框架来研究马耳他及其他的地区所历经的交汇与融合的过程。正当全世界许多地区都经历异质文化相互激荡和相互融合之际，这本以世界历史为着眼点，以澳门文化的发展过程为落脚点的新书确实具有特殊价值。

张信刚

2008年3月于未名湖畔　张信刚（1940—），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荣休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名誉教授，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

序二

最近 20 多年，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近 10 年来，在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下，其纵深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而且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从早年的泛泛而论到近年的微观探索，无疑是可喜的转变，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需要回头用宏观视野来考察。只有这样反复不断地远观近窥，才不会在深入探索的过程中迷失方向，才能在往后的深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然玲的博士论文，正是此一尝试的结果。

以长时段的全球视角来考察澳门历史，既十分重要也极其必要，因为澳门的开埠与发展就被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结晶。换一句话说，如果文史学界不这么做，澳门弹丸之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就无从彰显。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文艺复兴、大航海活动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本身，也深刻影响了近代全球格局的走向，亚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而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急剧变化。作为中西方对接最早、也最久远的澳门，身临其境地目睹、感受和经历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客观研究这一段历史，科学重构其演变过程，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对当今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和的实践也不无启示。

葡萄牙基于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在欧洲早期航海扩张中脱颖而出，一度引领世界早期全球化的潮流。在西方东扩的进程中，中西文明也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和海洋贸易的大规模迅速发展而从自守封闭走向相遇、相识、相交和相融。在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背景下，中国南海之滨的澳门为葡萄牙人所据居，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也成为中国最早全方位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从这个角度看，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澳门文化的近代发展是在全球背景下展开的，而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解读，也必须从东西方文明自我封闭到相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碰撞、互动重组为一个新的全球世界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中来审视，并将其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来剖析。

在一篇论文中全面系统分析和研究16至19世纪的澳门文化发展史，回顾与思考长达四百年的澳门文化发展脉络，其勇可敬，其志可嘉，但是否科学客观而令人信服，会否显得过于简单粗浅？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不仅读者会产生疑窦，作者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也有同样忧虑。至清期前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朝代、天干地支，并没有世纪的概念。而如今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并将其纳入世纪的范畴之下，去评价褒贬过去的事件、人物，去解构分析其纵横交错的关系，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意味。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的确，史学思考和史学研究方法不能、也不应该受历史当事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观念所局限，用长波段、世纪更替的眼光看待历史，也逐渐为史学家认同，成为一种常用的史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16至19世纪的澳门，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这期间的澳门无论成败喜悲，都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并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外交方略等领域，无不给国人提供成功者的经验和失败者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对这四百年的文化发展的回顾和梳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玲以澳门作个案，把研究范围锁定在澳门错综复杂、神奇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对这一较长历史时期澳门出现的一些重要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进行深入探讨和理论分析，不仅有利于人们去解读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演进过程，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东、西方文明勾画出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为今天我们与西方人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某种借鉴。正如她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的写作宗旨是希望 “从宏观层面回顾东西方文明的特

点和相互交往的历史，以澳门文化发展与文化特征的演变为主线，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夹缝中的澳门生存与发展。”

在本书中，然玲对大量文献进行了研读、比较和综论，并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澳门，有四种文化向量深刻影响着澳门的发展轨迹：国家政治文化、地方文化、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而且这四种因素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对澳门文化的影响力度也时大时小。在早期，以耶稣会为代表的 “拉丁文化”的入侵给澳门独特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带来了发展动力。到 17 世纪中叶，则迎来了澳门重商主义的辉煌。这一时期，作为两条全球贸易航线的中继站，澳门不仅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更由于处于东亚、东南亚海域的朝贡贸易网上，也与周边区域的文明产生互动，在东亚、东南亚海域的贸易网上还形成了 “多条文化传播带和异质文化交汇圈”。入清以后，澳门文化不仅递进发展，又加入了新的元素，在演进中更加突出了国家权力因素。澳门作为明清两朝处理对外关系体制之内的一种特殊治理模式，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势国力的兴衰，中葡在澳门的力量表现出此消彼长、时疏时紧的现象。中国政府在清前期逐步加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澳门的主导性地位，澳门在整个中国政治文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同时，葡萄牙人从初期主要强调澳门远东基督教传播中心和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和作用，逐渐突出、强化了其远东殖民地的国家权力因素，试图在意识形态、文化导向方面使澳门走向 “西化”。于是，清葡双方围绕着澳门问题出现了一系列权力角逐、较量和斗争。但是，基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羁縻、怀柔的对外宽容文化观，也由于居澳葡人对中国文化认识深度的加强及其对自身文化和行为的不断调适，葡人最终赢得了长期居澳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从 17 世纪后半叶到 18 世纪末的百余年间，西方文化进入澳门的步伐加快，影响力度加深，澳门地方文化的特色日益成形成熟，多元文化模式日益清晰突出，形成了与内地文化氛围迥异、个性彰显的城市文化特色。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商业文化和宗教文

化开始受到英国新兴殖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随着清朝国力的衰退，澳门无法再受到天朝的特殊庇护，殖民地与中华帝国渐行渐远。于是，中国的国家政治文化影响力度在澳门全面下降，澳门逐渐变成了一座 “有着诸多历史遗产、但又停滞不前的城市”，其文化的递进重构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步入停滞期。

然玲通过大量的历史史料和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澳门文化应该是一种发育不健全的、甚至是 “畸形”的城市文化有机体：

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模式，既非 “冲击－反应”模式，又非 “传统－现代”模式，也非 “帝国主义”模式，或 “中国中心”模式。澳门文化所特有的这种“递进重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 “物理反应”的过程，又是一个 “化学反应”的过程，而且是多种文化不断 “调适”的互动过程。其文化的组合形式既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混合物”，又是多元文化共融的 “化合物”。几百年来，澳门城市对所有民族和阶层的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一直得到延续。它集多种因素于一身，既具有殖民城市文化的一些文化特征，又带有某些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特点，同时又带有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残余。

作为一个没有在澳门长期生活的学者，能够作出如此鞭辟透彻的分析、得出如此生动深刻的结论，足证其用心之多、用力之勤、用意之善。这一分析和结论，对我们理解当前澳门的社会文化气氛和环境、为我们探索特区发展的前路均不无助益。澳门历史上促成多元社会和谐与共的文化元素及其互动调适机制，在全方位开放的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令社会各种深层问题和矛盾急速表面化，也使得我们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思之中。如何在保存传统价值的同时又吸纳现代价值，令澳门独有的文化特征生生不息；如何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又产生活力，令新生的特别行政区在回归祖国之后又坦然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稳定有序地步入国际化的轨道，并可持续地发展繁荣，诸如此类重大问题，恐怕不能单靠经济和社会政策来破解，更需要我们从文化深层去

寻求答案。这是摆在学界面前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玲的论文适逢其时，足资参考，可贺可喜。

当然，本书仅仅是一篇博士论文，难以承载如此之重任，诸多问题尚需更多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即便是论文所涉及的问题，然玲在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惑，她受何芳川师之嘱托，也多次同我长时间沟通、切磋。诸如用 “递进重构”模式来概括近代早期澳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是否科学，是否还有更好、更得当的方法；历史学研究与文化分析的复杂性究竟如何结合，合适度在哪里，而且如果从较大规模、从较长历史波段，并从文化分类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城市的文化史，还要提出澳门文化发展的递进性、重构性等特征，这种研究方法是否合理？限于理论水平、分析能力和写作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我想，作者出版其博士论文之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多年前，然玲开题之时，何师芳川兄领她来看我，仿如昨天，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然玲论文付梓之时，芳川兄早已乘大帆船远游他方，其高大身躯，消失于地平线。史学者是不该相信宿命的，但近年种种事件，又叫人不禁自问：莫非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忍也无权谴责历史的残酷无情，惋惜生命、感慨命运之余，更令人对乐天知命的芳川兄增添了几份敬意。的确，我十分佩服他的宏观历史视野，佩服他的独特选题眼光，也万分欣佩他的严谨治学精神。澳门历史文化有今天的成绩，全赖似芳川兄这样的学者的鼓励、支持、推动和耕耘。

我知道，要不是芳川兄的激励指导，然玲是不敢贸然接受如此重大的题目来写的。芳川兄去世后，其精神依然感召着然玲。在吾友张凯教授的指导下，她终于完成了论文。如今然玲嘱我写序，于公于私，当不敢推托。然玲论文的面世，若芳川兄泉下有知，也应老怀大慰。然玲当不负尊师之重望，师承其志，继续努力，不断有新成果面世，为澳门文史研究、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吴志良

二〇〇八年一月初稿于长沙

除夕定稿于澳门　吴志良（1964年—），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绪论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它究竟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不能归入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一直聚讼纷纭。早在1997年发表于《屏幕》杂志的《文化研究的评价》中，柯林·斯巴克斯（ColinSparks)就指出了界定文化研究的困难乃至不可能：

在任何精确的程度上界定文化研究都是极其困难的。给文化研究画一条清晰的线索或说我们从一个侧面发现文化研究的适当领域是不可能的，指出足以标志文化研究之特征的整齐划一的理论或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的观念、方法和关切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都在文化研究的方便的标签下面杂陈在一起。

文化研究采取多种形式，并获得了众多文化研究者的赞同。他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就是逃避与拒绝学科规范，而这种观点也是非常流行的。出版于1992年，在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文集《文化研究》的编者们也曾在“引言”中坚持和重申了这种立场，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排除在外。

英国学者保罗·史密斯则通过对欧洲和美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思，对未来文化研究进行了展望。其核心观点是：必须复活马克思主义以重新激活文化研究。作者在文章中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对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反学科化和多元化取向提出了质疑。

中国以往对文明、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世界主要的几个文明形态进行比较上，而且以往对研究文明形态，大多是对较大的自然区域的研究，涉及的地理范围很大。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视野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欠缺个案分析，尤其欠缺的是将中西文化结合的长时段历史的比较分析。为此，国外一些东方学、中国学研究专家曾提出“必须对中国进行分地区的专题研究”等观点。

在谈到文化研究时，也有学者强调要用 “大历史”的眼光去研究文化。钱穆曾言：“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体内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历史的真正意义。”他还强调：“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黄仁宇则提出 “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的观点。

一、文化视角下的澳门个案研究

澳门的文化研究，吴志良曾强调要用更加宏观的视野去审视澳门文化发展脉动。他认为，澳门文化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某些具体史实的搜集、考订和阐述，而要在此基础上联系近现代中国、世界历史的进程，深入揭示中葡两国之间及其所代表的东西文化间的多层次的交融，尤其是澳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内容更加全面和丰富。也有的学者提出：“澳门历史的独特发展涉及的面很广，它不但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内政和中葡关系，而且早就陷入了复杂的国际关系漩涡之中，受制于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既强烈而又异常复杂。……澳门历史是中国明清史、特别是清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分支。”

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市舶司舶口从屯门移至澳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此后，葡萄牙人逐渐定居澳门，聚者日众。澳门逐渐从一个简陋的舶口发展成为一个连接东西方全球贸易航线的重要港口和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东西方多元文化在此相遇，碰撞、较量，共生、交融，乃至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形成了澳门早期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

澳门回归以后，关于澳门文化的研究进展很快，相关学术论著不断问世。2001 年 《文化杂志》曾专门邀请内地广州、南京以及香港和澳门本地的学者对澳门是否可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意见征求，在对澳门文化的独特性进行勾勒时，与会学者基本认为澳门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2005 年 8 月，联合国批准澳门为 “历史城区”遗产保护地，并以其鲜明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澳门的初始发展实为偶然，但它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被一些依赖性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商业、贸易等因素所钳制，长期生存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夹缝与交织之中，并受制于国家政权的控制，由此产生了在历史上澳门一枝独秀、与众不同的城市特色：多国居民定居、多元生活形态、多种风俗习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蕴含着东西方多种文化理念等。尤其是在研究西方强权之间的转换时，澳门更具独特意义。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澳门一直是一个与西方多个强权国家打交道的城市，它势必承担着 “双重义务”或 “双重角色”，即把自身的文化传到自身以外的文化中去，又把自身以外的文化引回到自身。金国平曾言，“多数澳门史作者偏重历史的连续性，但交互性应为澳门史最独特之处，而澳门的内部发展又是解读许多历史现象的密码”。因此，澳门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澳门处在当时两种文明冲撞、交融的状态之下其独特的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以澳门历史演进和文化模式之生成为解析对象，还能够为反驳弗朗西斯·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所宣称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统治一切的观点提供实例，也可以对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以及他在后来的论著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极力宣扬的：所谓文明的冲突 “是一场全球层次的部落冲突”；“不同文明团体之间，几乎永远不可能是密切的；相反这种关系多半是冷淡、甚至充满敌意”等观点提出质疑。

本书试图以澳门这个微型社会和城市作为个案来分解化合，剖析它在中外交流史、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研究西方文明是如何融入、汇合、演化中国文明等，展现澳门四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 “递进重构”模式的发展变化过程。

今天，当人们都在探讨中国究竟能否和平崛起的时候，回顾西方在其刚刚崛起之时与我国交往的那段历史也许会带给我们几许启示。研究澳门文化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形成的 “递进重构”模式，对当下探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处，以及我国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鲜明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与本书有关的几个主要概念

1.关于文化、多元文化主义

在历史上，“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①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建构人类精神大厦的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又通过符号、价值、生活方式等形式体现出自己独有的时代内涵，文化的概念也在不断丰富、延伸着自己的内涵。文化的覆盖面也很广，一般广义上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具体包括语言、文字、观念、信念、习惯、礼教、风俗、用具、技巧、艺术、仪式、礼节等许多方面。因此，正确的文化理念必须考虑文化中包含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文化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完成形态的静物。因此，不能把文明塑造成静态的理想形态。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变化。

何谓多元文化，其产生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是什么？多元文化主义有何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悖论何在、前景如何？诸如此类问题，英国人类学者 C.W.沃特森在翔实考察了不同政治、历史环境下

的国家对多元文化主义认知的不同态度和重点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观，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并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历史观，它关注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性。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是多民族的不同经历相互渗透的结果。它强调种族平等和宗教宽容，追逐的最终目标并非是文化平等而是社会平等。从这个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其功能在于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追求不同群体在文化和物质上的繁荣以及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尊严。沃特森还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内涵的丰富性源自其起源的复杂性。

关于文化模式和文化多样性的起源问题，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论著 《文化模式》之首页，即引用了迪格尔印第安人的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她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但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无穷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价值取向，通过形式化方式演变成风俗礼仪，并进一步形成这个部落或民族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该部落、民族的文化模式。的确，每一种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总包含着其独特的、不能为其他社会或民族分享的目的。而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本民族的经验和生活习俗等模式，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形成本社会或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的模式化决不能轻视，不能把它看做是简单的、意义不深的琐事。诚如现代科学在许多领域所坚持的那样，整体不仅仅是其各部分之和，而且是产生一个新实体的各部分的独特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为此，文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它们固有的特质之总和。在文化组合的整个进程中，其进程的作用、各种具体因素也许没有必要去认

识、探究。但是在人类行为的 “模式化”研究中，如果忽视了它，那就意味着放弃了用理智阐明它的可能性。

本书中的 “文化”，主要是指生活方式以及对价值观的判断。澳门文化发展多元而复杂，本书仅抽取若干重要因素加以分析，着重提出四种对早期澳门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文化因素：(西方)传教士文化、商业文化、国家政治文化和地方文化，从这四个方面分析澳门过去数百年来文化的发展进程。尽管影响文化的因素非常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诸因素在影响文化发展进程中所施作用的孰重孰轻。仅就澳门而言，笔者认为历史性的因素非常重要，这主要是指当初澳门的开埠及至后来的城市发展，与到此地的葡萄牙人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人士，即经由贸易网络关系和宗教传播而来的国际人士 (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他们是早期构成澳门外来文化的承载主体，是后来更为广泛的西方文化的传播源。

2.国家政治文化

英国学者马克.J.史密斯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在上层建筑中的角色就跟文化一样富于争论。有时文化与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同一个意思。类似家庭、亲属、教育、宗教和群体组织这样的制度曾经被视为文化传播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价值的来源。”“意识形态和文化术语是可以相互交换使用的。……文化表征可以被解释为潜在阶级利益的附带宣言”。本书论及的国家权力文化 (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指国家政治文化，主要是指明清两朝在治国理政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层面的文化内涵，着重强调由儒家文化构成，表现为官僚系统的政治文化。比如具有朝贡特色的中心—周边结构，在文化上自视是天朝上国，文化优厚等。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长期占据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家族制度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儒学则是将家族关系放大为国家准则的黏合剂。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纷纭复杂，研究起来颇

为不易。关于儒家文化的概念就存在许多争议。书中所及的儒家文化并非儒学本身，而是指中国历史上曾经以儒家的思想及伦理作为国家政治文化象征的社会规范。对于16至19世纪的澳门，尽管外来因素源源不断地涌进澳门并施展着各种影响，但决不可忽视另一方因素的强力作为，即支撑澳门发展的广袤腹地、强大的国家政治文化所施之的影响。这是以科举考试和官僚制度等政治制度和文官制度为主所构成的中国精英文化主体。

从中国近代城市的具体发展进程来看，政治—国家权力对城市和文化的影响具有普遍的决定性。这与西方国家宗教对城市和文化所起到的强烈和持久的作用与影响不同。在中国，政治因素始终高于宗教因素。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政治对文化的干涉更是远远大于宗教对文化的干涉程度。“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两千多年间，经历多次战乱反复破坏、恢复、繁荣、再破坏的循环，每次政治上改朝换代之后，总会带来城市与文化的变动与发展。不仅如此，中央集权制度使许多硬性的城市与文化观念方针、政策、措施等获得政治权力方面的强制推行。因此，在中国，政治因素对文化与城市作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等都比宗教、经济等因素，显得更为直接、明显和强烈。因此，本书所指的国家政治文化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导向、措施，尤其体现在明清两代对海外商业贸易和宗教文化方面出台的一些硬性举措和强制性规定等。

3.岭南文化

文化是在种族、环境、时代的系统中发生、发展的。中华文化的民族差别，其实也是地域差别。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被广泛用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因此，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的做法有碍于人们从共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挖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